

“大跃进”运动中的工业“技术革命”

茅 坚 鑫^{1,2}

(1.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2.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环渚街道办事处,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大跃进”时期,全国范围内在工业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技术革命”运动。但是,这场运动是在政治挂帅的旗帜下进行的,弥漫着“大跃进”时期的狂热“左”倾气氛,主要依靠发动下层群众的方式,而忽视了技术发展固有的规律。这场运动不仅未促进技术的发展,反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危害,因此只是一场科技浮夸。而当时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亦是造成“技术革命”运动南辕北辙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技术革命; 工业化; 群众运动; 浮夸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3)04-0041-07

在“大跃进”运动中,以农业上“合理密植”、“深耕土地”和工业上“土法炼钢”为代表的所谓“技术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科技浮夸,是造成“大跃进”运动全面失败和国民经济崩溃性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总结这场闹剧,无论对于吸取“大跃进”运动的教训,还是对于提倡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精神,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随着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我国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但是总的来说工业还比较薄弱。毛泽东开始批评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亲自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而“技术革命”作为支持“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手段,被予以高度的重视。“技术革命”大致可以庐山会议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从1958年初至1959年的庐山会议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各行各业的“技术革新”,提高工业生产率;庐山会议至国民经济调整前为第二个阶段。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

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1]25}。

南宁会议后,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不断革命论”,认为1956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1957年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了,而“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并要求“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2]45-46}。毛泽东对技术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3]1056}。

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日益“左”倾,各地也开始不断地“跃进”,各种大干快上、浮夸风、共产风逐渐蔓延。一般认为,1958年5月召开中共的八大二次会议是“大跃进”全面发动的标志。在会上,刘少奇作了工作报告,对技术革命有详细的阐释:“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

收稿日期: 2013-01-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05JJD810001)

作者简介: 茅坚鑫,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

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2]303}，“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2]304}。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指出“技术革命”的方向和任务,而进行的方式是群众运动。1958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技术革命进军》,称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技术革命的任务是“充满革命精神的纲领”,是“机械化的纲领”和“电气化的纲领”,并宣扬“中国的革命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6月24日,又发表社论《搞技术革命一定要发动群众》,指出“只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普通的工人和小知识分子也能创造新的技术,促进生产的巨大发展”。大力宣扬要贯彻群众路线,为技术革命的舆论造势。

审视这些报告和社论,我们可知在当时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技术革命”所提出的计划的,其最初关于“技术革命”的计划就已经脱离了实际。“大跃进”的气氛就注定这场“革命”只能是一场浮夸。

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和舆论的大力宣传,中央把直属企业下放,扩大企业自主管理经营权,各地大办地方工业,“技术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1959年夏庐山会议以后,在中共党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也中断了之前对大跃进混乱局面的纠偏,掀起更大规模的继续“跃进”。为此,“技术革命”运动也随之升温,在全国范围的工业领域内,发动了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四化”运动,使“技术革命”进入新的高潮。

196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决议》,并在批示中指出“所有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市委,都应当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像太原市委那样,立即做出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规划,并且付诸实施”^{[4]19}。

196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道路继续跃进》,宣称要

“争取在十年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现代化企业也必须革新技术》,指出“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是我国所有企业继续跃进的康庄大道。……在现代化大型企业里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关键在于坚持政治挂帅,贯彻执行洋土结合、大中小结合的方针,大搞群众运动”。随后,毛泽东在1960年3月份连续转发了4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并在批语中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要求“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3]1057}。

这一连串的措施推动了“技术革命”向新的高潮阶段的发展。事实上,庐山会议后因反彭德怀而引发的“反右倾”运动,不仅没有纠正浮夸,而且使浮夸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二

工业上的“技术革命”运动,随着工业“大跃进”而兴起。自中央发起号召,各大工业部部长带头作高姿态鼓动,地方上便纷纷响应,从上到下,开足宣传机器的马力为“技术革命”造势。

舆论上的高潮推动了“技术革命”在工业上的各个领域内全面展开,而“技术革命”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在“大跃进”狂热的“左”倾氛围中,关于“技术革命”的群众性浪潮被推得很高,“卫星”也放得很大,我们可以从以下事例窥见“技术革命”运动之一斑。

1. 组织发动群众提建议,其中带有很大的浮夸成分,很多是“为提建议而提建议”。1958年5月份,太原耐火材料厂1300多名职工在3天之内,写大字报提出技术革新建议2400多件,并已采纳了86.6%^{[5]18}。1958年“七一”前后,甘肃玉门油矿炼油厂10天内就提出革新建议12000多件;随即在全矿开展技术竞赛运动,不到一个月共计提出建议33000多件。而在8月,一个月竟有

建议 200 多万件,被采纳 41 万余件,创造价值 6 050 万元^{[6]19}。在辽宁营口,20 个地方工业单位,1 至 4 月份,提出改进操作方法、改进劳动组织等方面的建议 918 件,已采纳的 777 件。针织二厂工人刘润生,改进制造剪刀片的工具和操作方法,由日产量 40 把提高到 4 000 把。1898 年建厂的常州戚墅堰机车厂运用土洋并举、从土到洋的方法,大搞群众运动进行技术革新,提出 700 多条建议,制作了近百种工艺设备。从 1958 年 6 月到 1959 年 8 月,已经生产 47 台机车^{[7]10-11}。

2. “个人英雄主义”泛滥,无限拔高人的主观能动性,非常不切实际。如上海电机厂直流电机车间的六级车工朱恒,几乎是个无所不能的“技术革新”多面手,从 1959 年 1 月到 10 月即提出改进工具、改进操作方法、简化产品结构、自制土设备等大小革新 280 多项,实现了 180 项,节省了 5 000 多个工时,月月提前超额完成生产任务^{[8]52}。杭州通用机器厂装配工俞渭法、吴光清,创造了刮空气压缩机的主轴承婆司的搪刮机,工作效率提高 480 倍^{[9]18}。而上海机床厂普通的扫地工寿奎富,并没有上过大学、留过洋,在短短几个月内,文化上,逐步掌握了从高小到中学再到大学,从中文到俄文,从算术到代数、三角、几何、力学等知识;工作上,从看图到画图、从设计零件到设计机床,成为一名出色的精密磨床设计师,试制的新型万能螺丝磨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8]22-23}。一些著名作家亦撰写此类文章,其中一篇讲的是上海一名严重烧伤的钢铁工人丘财康,其受伤程度异常严重,国内外罕有存活的先例,上海著名的外科医生对此均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医院党委组织不同意这种看法,通过发动群众提建议,打破医院陈规,最后成功挽救了丘财康的生命^{[10]24}。

3. 今日观之,很多所谓“技术革命”其实是瞎胡闹,而科技专家、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却被弃之一旁。河南焦作煤矿的 100 多个工人,不顾总工程师和矿务局长的反对,一起献计献策,先是把 40 多台必须高级司机操作的固定机器,改革成为无人操纵自动化机械;之后集体研究设计,用了 40 多天把全矿所有机器都改成了自动化运转或远距离操纵,号称基本完成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11]98}。食品工业上,酿酒法进行的“革新”尤其令人咋舌,郑州酒厂创造“晾渣操作法”,打破了千百年来

“扬渣操作法”,使淀粉出酒率达到 81% 左右的水平,使酿酒工人劳动强度减轻了三分之二,每天每班少操作 9 万 3 千多斤,工时缩短到 8 小时以内^{[12]23}。而常州溥利仁油厂更是厉害,其发展多种经营,号称“万能工厂”;甚至利用稻草酿酒,其实就是将用糠饼粉酿酒的那套发曲和培养酵母的办法用之于稻草,剩下的酒糟也不浪费,用来造纸,不到三个小时,就试制成功了一种拉力强、洁白厚实的纸张^{[13]81-82}。曾在国家计委工作过的王泓,回忆了河南叶县的一些哭笑不得的“奇事”。“大跃进”时期,该县办起了飞机厂,把全县所有的铁匠都集中于一地,共同研究,还真打出了架飞机,就是没有发动机,不会飞;甚至还有给牛做牙刷的工厂,以为要进入共产主义了,牛也要刷牙讲卫生,但最后做出来的牛牙刷完全是一堆废物^[14]。

庐山会议之后的“技术革命”运动转入了“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四化’运动”。事实上,工业、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业的“四化”运动与当时的各种大办地方工业有紧密的联系。由于各种“大办”,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原材料空前紧张,运输能力不足,开展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技术革命”,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庐山会议之后的“技术革命”运动的方式和手段均与前一阶段相同,只是侧重点变了。

如天津市称从 1959 年 10 月底至 1960 年 2 月,全市各工厂、企业提出的革新建议近 100 万件,其中有 50% 左右的建议已经实现,实现的较重大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项目达 5 000 多项^{[15]46}。在河北龙烟钢铁公司的烟筒山铁矿,从事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的人数,从 1959 年 12 月的 35.3% 增长到 1960 年 2 月的 90%,号称从打眼、放炮、支柱、放顶、耙矿、装矿、运矿一直到倒矿,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一条线^{[16]20-30}。福建闽东第一茶叶精制厂,实现了制茶生产的全程自动化,工厂从 2 800 多人减为 700 多人,制茶工效提高 21.8 倍,并且质量有保证^{[17]17}。

上海市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亦不能落在后面,宣称在 1960 年头两个月就有 12 572 项手工劳动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厂内运输有 1 355 项实现了机械化,群众提出的革新建议 105 万条,已实现 33.3 万条。太原市则在 1959 年 12 月初到今年 2 月 10 日的两次“技术革新”战役中,职工

群众自己动手制造了 13.8 万多台大小机具,有 52% 的工种的工人摆脱了手工操作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由原来的 42.3%, 上升到 60.9%, 在 70 天内上升了 18.6%, 平均每 10

天上升 2.66%。沈阳、哈尔滨、天津、旅大等城市情况见表 1^{[18]398-399}。中共中央推断,依此速度,到 1960 年 7 月底左右,全国大中城市可能基本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

表 1 几个城市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上升概况统计

市名	起讫日期	原有水平(%)	新达到水平(%)	平均每 10 天上升(%)
太原	1959.12—1960.2.10	43.3	60.9	2.7
天津	1959.12—1960.1.30	42.0	54.0	2.0
旅大	1959.12—1960.1.30	47.4	54.6	1.2
沈阳	1960.1—1960.2.10	45.0	57.0	3.0
哈尔滨	1960.1—1960.2.10	51.0	60.0	2.3

由表 1 可以看出,把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的上升速度具体量化,并制订计划,规定期限,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技术的提高需要点滴的积累和不断的努力,岂能靠运动的方式一步登天?

“技术革命”采用的是自上而下刮风式的推进运动工作的方法,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正确的指示,也被扭曲了,往往变得面目全非。如改革规章制度,下放管理权,“两参一改三结合”^①等,更不用说一系列过高的指标,一些并不科学或只在一定条件下见效的具体措施、典型经验被拔高为通用的普遍经验,硬性加以推广或贯彻,所带来的副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为了完成“技术革命”,当时的工人加班加点,完成突击任务,身心俱乏。上海甚至还专门出台了《关于保证工人农民睡足歇好的规定》的文件,要求工厂充分保证各行业工人农民的睡眠,严格控制加班时间^{[19]353-354}。“技术革命”和大炼钢铁一起,构成了工业“大跃进”的协奏曲。

三

1958 年的“大跃进”,为了完成钢产量比上一年翻番的指标,要“钢铁元帅升帐”,大搞群众性的炼钢。在“技术革命”中间,群众性炼钢是很重要的内容。以土法炼钢为代表的土法生产方式,是“大跃进”时期“技术革命”运动中一个典型。当时鼓吹土法生产本身就是技术革新,是生产技术上的创造。1958 年 10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土铁炼好钢》,称“土铁炼钢,是目前钢铁战线上一个新的课题,一个技术难关,但是,这个关

非过不可。不仅是我国当前钢铁生产中的迫切课题,而且,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还具有重大的国际科学技术意义。……要打破‘洋’办法的束缚,创造一套适合于中国原料情况的炼钢法”。土法炼钢领域的“创新”可谓层出不穷。1958 年 8 月,冶金工业部在湖南邵阳召开全国地方高炉会议,并选取了数种优秀高炉作为样本向全国推广。

1958 年 10 月 11 日,全民炼钢开始步入高潮阶段。冶金工业部在河南省商城县召开土法炼钢现场会议,着重介绍了商城和郑州两种土法炼钢,这是两种典型的土法低温炼钢法。商城的土法炼钢,炉子是用黄泥和砂子做的,木制风箱,原料可以用白口铁,也可用灰口铁或废钢铁,燃料是木材和木炭,这种方法是民间炼钢的遗产,每天可产一吨多低碳钢。郑州土法炼钢是反射炉,是郑州农业机械化学教师根据四川威远等地土炉改进的炉子,可以用泥巴糊,只用少量的耐火砖、耐火泥,鼓风采用电动马达带动机械,原料可用废锅铁和各种土铁,燃料主要是烟煤。这种方法每小时可以出钢 1 次,日产量可达 1 吨以上。

此外,在江浙一带,并未有冶炼钢铁的历史,也创造出不少简易的土法炼钢方式。如土缸炉炼铁,是浙江嘉善地区的职工创造出来的炼铁方式,炉缸是用两只常用的无底水缸合起来,把合在上面的缸底全部打通,下面的水缸一边钻上出铁口、出渣口,另一边钻上进风口^{[20]3}。

这几种炼钢方式的原料一般以废钢熟铁为主,还不能以生铁为原料来冶炼,钢的质量不稳

^①即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改革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员三结合。其实早在 1958 年大跃进初期阶段,一些企业就已经初步运用此方法,后被中共领导人吸收,并在 1960 年 3 月被赋予“鞍钢宪法”的形式。

定,含碳量忽高忽低,磷、硫含量比较高。

为了解决土铁炼钢的问题,冶金工业部组织了工作组进行试验。他们在半吨和一吨半的转炉中,用河南省的土铁 80%,掺洋铁 20%,炼成了沸腾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把酸性化铁炉改成碱性的化铁炉造碱性渣来脱硫,同时在化铁炉增加热风炉提高风温,以提高铁水温度,在转炉上,采用三排风眼,进行面吹和留渣操作,以及改善生产组织等^{[21]2-5}。

在河南省,从省委到有钢铁任务的地、市、县委和公社党委,都是第一书记挂帅,而且许多党委书记亲自上前线,深入到采矿现场、炉子现场,用“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手段进行炼钢。商城县出动了 129 000 人,其中组织了建炉突击队 133 个,3 080 人;加工工具队 489 个,3 644 人;备料突击队 135 个,8 654 人;运输队 174 个,6 527 人。苦战两天两夜,突击建炉 1 390 个,加工钳子、炒杠等工具 2 800 多件,并把 5 800 多吨生铁运到炉边^{[22]61}。许多党委书记和干部亲自办钢铁“试验田”,仅南阳专区就有 480 个“书记炉”,上千个“干部炉”。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的“书记炉”、“指挥炉”、“干部炉”、“实验炉”,大约有 1 万个。河南省按生产条件和炉群部署划分战区或钢铁基地,组成区域指挥部,统一指挥调度;实行“管理工厂化,生产专业化,工作计划化,炉子定型化”,同时编成采矿、挖煤、冶炼、建炉、运输、修配等专业大队,或叫师、团、营、连^{[22]56-57}。

由于炼钢造成的与秋收劳动力的矛盾,闽北地区各级领导机关组成钢铁、秋收、后勤三大指挥部,群众组成钢铁、秋收、伐木、基建和后勤五大兵团,群众劳力实行军事化、战斗化、整体化。

在湖北鄂城县,还办了一所钢铁大学,具体要求是三炉毕业。第一炉入学,只是站在旁边看,听讲课。第二炉边看边学,组织讨论。第三炉测验,参加学习的人每人亲自操作,能够炼出生铁,就算毕业了,并由大学发给毕业证书。先后有 200 多人从钢铁大学里毕业出去担任了技术员^{[23]16}。该县还创造“蚂蚁攻泰山”之法,即在家建小“卫星炉”,甚至烧茶的炉子也用来炼铁,小的一天能出铁 4 斤,大些的出 30 多斤。号称“户户建土炉,人人炼铁忙,莫看土炉小,出铁赶武钢”^[24]。这种炉子寿命很短,多的能烧十几天,有的只有 24 小时。

在湖北恩施,还利用做饭用的土灶当土炉,把

矿石装在罐子里,边做饭边闷铁,每罐可出 405 斤烧结铁。恩施地委迅速推广此经验,到 10 月 5 日,该地区已达到日产生铁 3 261.24 吨的水平^{[25]550}。

此外,还有土法炼铜、土法炼不锈钢、土法采矿以及各种土法上马的工业等,在地方大办工业的背景下,作为“技术革新”的重要“产品”,各种土法生产层出不穷。如南京第一机械厂制造了土机床、土设备 37 大类 72 项,共 371 台,并在北京全国土设备展览会的 7 种土设备,分别得了奖(一等奖 1 种,二等奖 4 种,三等奖 2 种)^{[7]24}。上海郑兴泰汽车机件制造厂本是一个小厂,掀起了大搞土机床为中心的技术革命运动,发动工人,仅 3 天就形成了加工拖拉机主要零件的土机床的轮廓,造出了 15 台土机床,一个月可生产 500 个拖拉机的变速箱、转向机外壳和螺旋伞齿轮^{[26]97-99}。

实际上,土法生产出的产品合格率低,且成本高昂,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以土法炼钢为例,特点是铁多质量差,钢和钢材少。土铁特点是矽低、硫高、锰低、碳低,是无法用来炼钢的。1959 年 1—4 月份全国生铁产量为 606 万吨;其中约有 150 万吨是不能使用的坏铁,占总量 1/4 左右,这主要是各种土法生产的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每炼 1 吨铁所需铁矿石为 2.5 吨左右,所需焦炭 0.8 吨左右;而 1959 年 1 吨铁所需铁矿石 3.5 吨~4 吨左右,所需焦炭 1.3 吨左右,地方小高炉甚至在 2 吨以上^{[18]115-116}。据当时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每一吨铁的成本,大高炉 1959 年是 108 元(1958 年是 100 元),小高炉是 345 元,国家每吨铁的调拨价格为 150 元。因此,小高炉每生产一吨铁,要赔 195 元。1958 年生产的 1 000 多万吨土铁和烧结铁,多消耗的煤炭就约近 4 000 万吨^{[27]93}。仅江苏省就因土法炼钢亏损 14 109.6 万元^{[28]427}。福建省大部分则是拿木炭当燃料来炼铁,等于是 600 元钱的木材炼出 40~50 元的铁^{[29]36}。

而为了大炼钢铁,大砍树木,造成了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大炼钢铁之后,仅湖北省森林面积就比 1957 年减少了 32.43%,其中成林面积减少 58.50%,森林蓄积量下降 33.70%^{[25]19}。可见大炼钢铁是非常得不偿失的。

四

通过以上的分析,所谓“技术革命”的真面目便显现出来了,即只是一味依靠群众突击、乱干、

猛干、蛮干的科技浮夸,完全可以说是一场穷折腾。河南新乡专区统计在1958年的技术革命中,有创造发明和重大改进者共79401人。其中,从职业来看,有普通工人、农民65746人,占82.75%;中小學生4707人,占5.93%,普通技師200人,占0.33%。从文化程度来看,文盲18905人,占24.8%;初小53580人,占67.7%;中学6834人,占7.59%;大学32人,占0.01%^{[30]15}。“技术革命”以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农民为主,有些甚至是文盲,而把专家、教授、工程师等文化程度高的人排斥在外了。

今天我们来“看”技术革命的闹剧,其产生是有深刻的原因的。技术上的真正的进步,要严格遵循科学技术自身的客观规律,精确的计算,严密的规章制度,严格的纪律和秩序,精细和准确的操作,尤其需要一批具有各种专门知识、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而在这场“技术革命”中,唱主角的却是普通的工人和群众,真正的科技专家却被边缘化了,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此阶段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中共中央曾一度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31]133-134}。

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之后,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发生“左”的逆转,被打成“右派”的55万多人中,知识分子占了大多数。这样一批本应是国家宝贵财富的人才,却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异己”,这不能不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不幸。经过反右运动,一般人员均不敢对各种“运动”公开持反对态度,工人和技术人员中犹豫和害怕的思想也在多次鼓动下被打消或藏匿于内心。

对于这场“革命”,当时一些中共地方干部亦持怀疑态度,结果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官员被批评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为“大跃进”和“技术革命”的开展扫清障碍。

况且,“大跃进”时期通常都是政治挂帅,政治决策取代技术决策,甚至政治决定技术,技术的成果被看成是政治上的优越性的显现,以为发动群众就可以促进技术革命,这也是那个时代左倾狂热性的体现之一。技术革命的初衷不是技术本身的发展,而是政治的需要,是国家实施“超英赶美”的策略的一部分,从而忽视了技术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

性。如此,技术的发展处处受到外界的掣肘,没有显示出其固有的独立性,不能依照自身的规律前进,以这种方式来寻求技术的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

进入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以后,“技术革命”才逐步降温,技术的发展才渐渐驶入正常轨道,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随之调整。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举行的科学家会议和戏剧家会议上,承认了“技术革命”的错误:“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32]366}。

3月5日和6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会上则讲得更为直接和明朗,他提出“脱帽加冕”,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脱帽礼”。同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阐释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事后,中共对一些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知识分子甄别平反,摘掉了一部分“右派”的帽子,并从生活上对重点保护的知识分子给予照顾。

遗憾的是,就是这些政策,也没有彻底摆脱阶级斗争的窠臼,况且在之后并没有被一直遵守。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特别是1964年以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认识越来越“左”,知识分子政策又回到“左”的轨道上来,这实际上意味着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中断。文革中知识分子遭受深重的灾难与此不无关系。

重温这段惨痛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深刻的教训和经验,是今后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尤需注意的。

参考文献:

-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 [3]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5] 工业战线上开展技术革命的经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58.
- [6] 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办公厅.现代化企业的技术革新

- 和群众生产运动[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59.
- [7] 大跃进万岁(江苏省建设成就通讯集)[G].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
- [8] 总路线的旗手,大跃进的标兵:第1辑[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 [9] 乐子型,芦相荣,等.鼓足干劲,赶上英国[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
- [10] 巴金.上海大跃进的一日[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 [11] 怎样开展工业技术革命:第1集[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
- [12] 河南省工业厅,河南省工会联合会.食品工业先进技术[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8.
- [13] 小厂开展技术革命的经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58.
- [14] 王泓.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J].炎黄春秋,2006(1):24-31.
- [15] 中共天津市委工业生产办公室.一九五九年持续跃进经验[G].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0.
- [16] 中共河北省委工业交通工作部.工业战线开展技术革命运动的经验[G].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0.
- [17] 中共福建省委工业交通工作部.技术革命红旗飘[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60.
- [18]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G].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 [19]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委员会,等.“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工业[G].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3.
- [20] 朱民安.土缸炉炼铁[M].北京: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
- [21] 裕民毛纺厂.铲炉炼钢[M].北京: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
- [22] 全民炼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23] 我们是如何成为日产生铁千吨县的[G].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
- [24] 鄂城发出生铁高产“卫星”的经验[N].湖北日报,1958-10-02(1).
- [25]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大跃进”运动:湖北卷[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 [26]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秘书处.高举技术革命红旗胜利前进[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 [27] 薛暮桥经济论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8]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G].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 [29]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大跃进”运动:福建卷[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 [30] 张超,宋俊生.谈谈技术革命[G].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
- [3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3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潘亚莉)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Mao Jianxin^{1,2}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2. Huanzhu Subdistrict Office, Wuxing, Huzhou, Zhejiang Province,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a large scale movement of the so-calle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as launched in industr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However, the movement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politics in command, filled with the Leftist frenzy typical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 It mainly depended on motivating the lower masses, and unavoidably ignored the law of technical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it caused enormous waste and harm rather tha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so it was just a technological flamboyance. Furthermore, the CCP’s wrong intellectuals’ policy was also a significant reason for the unwanted results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dustrialization; mass movement; flamboyance